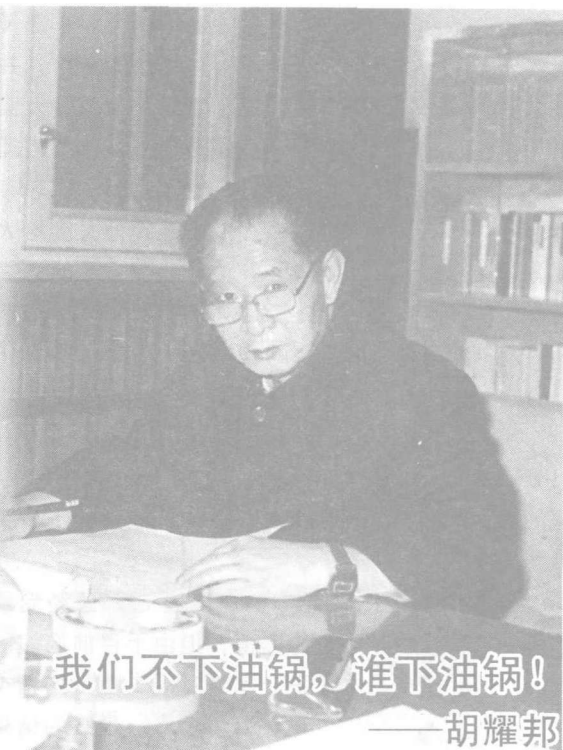


胡耀邦(1915.11.20——1989.4.15)湖南省浏阳县人。1933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1952年后,先后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书记。1962年,兼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11月起,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和陕西省委第一书记。1977年3月,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12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1978年12月,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随后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部长。1980年2月,他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7年11月,在党的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胡耀邦

圈点平冤案

——选自《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满妹

中组部的鞭炮声

1977年12月15日上午,西单商场北边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院里,忽然响起了一片鞭炮声,一群干部模样的人笑逐颜开地挑着一挂挂爆竹。光是聂荣臻元帅的夫人张瑞华,就买了十多块钱的鞭炮,一口气全放了,以当时的物价,这可不少呢!鞭炮声招引得行人驻足观望。大家都挺纳闷:今儿是个什么日子,这么喜庆?

这是为欢迎父亲第一天上任,中组部门前出现的从未有过的感人一幕。

人们在评论父亲的历史功过时,似乎有一种错觉,认为他在选择改变中国命运的突破口时,首先是打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然后才着手打破“组织枷锁”的。事实上,这两个“打破”基本上是同

步进行的。只不过它们发端于中央党校,逐步深入开展于中央组织部。

1977年初夏,父亲在家中客厅里与一位同志谈话时就曾忧心忡忡地谈道:禁锢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的,一个是精神枷锁,什么“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要执行”,一直到“两个凡是”,都是教条主义的。还有一个是“组织枷锁”,历次政治运动积累起来的冤假错案,各种错误的组织结论,把干部知识分子压得抬不起头来。他们的亲属、朋友,被剥夺了担任适当工作的权利,无法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一个精神上、组织上被禁锢、被压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么可能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竞争呢?

1977年7月,父亲经过认真思考,确定中央党校党建教研室的教学内容以重新确立党的干部政策为

重点,大力批判林彪、“四人帮”在干部工作中推行的“打倒一切”和以人划线的组织路线,迅速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在展开理论上拨乱反正的同时,他又为撼动党内“左”的组织路线,准备了一根坚实的杠杆。

党建教学内容确定下来后,他将文史教研室的杨逢春与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的叶杨、陈中等请到自己的办公室,和他们谈了两个下午,详细阐述了他的一些思考。父亲说,这20年来,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首先是中央政治局的生活很不正常。一是没有真正的集体领导,有时简直就是封建式的家长制;二是没有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得一些坏人趁机从中搬弄是非,诬陷好人。粉碎“四人帮”后有了好转,但还需要一个过程。对这样一个过程,虽不能操之过急,但也不能松松垮垮。今后要真正地广开言路,真正地实行“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还要加上一条,不装袋子。切不可动不动就把一些道听途说或诬蔑陷害人的材料,装进一个同志的档案袋。这就是后来被人广为引用的“四不主义”。

从1957年开始的20年来,一个接一个莫名其妙的政治运动,诬陷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没被诬陷的人只能装“哑巴”,当“白痴”。正如人们常说的:“有道难行不如醉,有口难开不如睡。”这样搞下去,优秀人才哪里还有热情和激情来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父亲要求这几位同志按他讲的思路写一篇文章,从理论上阐明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文章的题目就定为《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篇幅就按《人民日报》一个整版的块头写,在力求准确完善的情况下,越快越好。因为许多蒙受冤屈的同志和他们的亲属都在眼巴巴地等着。

三位作者一个多星期就拿出了初稿。经过10多次的修改,父亲又请来人民日报社的同志共同参与,这篇文章前后共改了17稿方才确定下来。

1977年10月6日,是胜利粉碎“四人帮”一周年的日子,父亲觉得可以将这篇檄文投掷出去了。10月7日,这篇理论文章以赫赫标题见诸《人民日报》。

此时,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就是解放干部、平

反冤假错案。而《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一文的发表,有如茫茫冤海升起的一线曙光,使几千万蒙冤受害者看到了自己政治生命复萌的希望。在一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社就收到了上万封信件和电报,收到的信件装了一麻袋,纷纷表示拥护平反冤假错案。文章发表当天,有的家庭竟然全家人激动得哭了一个晚上。

然而,组织部门有些人却非常恼火,认为这是制造新的不稳定因素。理论权威打电话质问:《人民日报》到底代表谁在说话?中央组织部的负责人也认为这篇文章是大毒草。

那天晚上,本文作者和人民日报社的几个同志不约而同地来到我家,将这些情况向父亲作了反映。

父亲朗声笑道:“这不奇怪,自从我们党诞生以来,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正确与谬误的重大斗争。有时恰恰是谬误的一方占了上风,这风还刮得很猛,简直是12级台风。但只要正确的一方沉着应战,坚持不懈地努力,最后总会取得胜利。现在我们也正处在与一股新的12级台风相抗衡的关键时刻。我们既然已经坚定有力地跨出了第一步,就绝不后退,并努力扩大已经打开的突破口……”

客人们告辞时,父亲用苏东坡的一句话鼓励他们:“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从这时起,这场不见硝烟的斗争,渐渐呈现出了“柳暗花明”的态势。当时即使是陈野苹、袁任远、张策、杨士杰这样一批中组部的老干部,也照样在家闲待着,有的粉碎“四人帮”后,还在被罚每天扫院子。这篇文章所提供的理论根据,不仅导致社会舆论四起,而且引发了中组部内部受极左势力压制,长期靠边站的老干部的激烈抗争。几天之间,老干部们纷纷站出来说话,中组部大院里贴满了大字报,愤然揭发中组部主要领导阻挠落实干部政策的所作所为,强烈要求立即妥善安排干部的工作。一位主要领导听说机关糊满了揭批自己的大字报,急忙指使下边的人:“赶快撕掉!”

这一撕,激起了老干部们的公愤。他前面派人撕,老干部们在后面又把新的贴上去。杨士杰还把撕下来的大字报捡起来,一捆捆地送到人民日报社,有的人则把大字报直接送给父亲。

父亲看了大字报愤愤不平,马上把《人民日报》和中央党校的几个同志请到家里,商讨如何冲破落实干部政策阻力的问题。

父亲说:“看来要确实解决干部问题,仍然关山险阻,这需要我们下决心,一关一关地闯过去。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过,‘我们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们的说法是: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

他提出要再组织一篇重要文章,谴责类似于中组部这位领导顽固坚持错误组织路线的行为,以《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为题,着重指出,一些主管组织工作的同志和部门,在落实政策上的拖延推诿,严重妨碍了这项工作的顺利进行。

他希望《人民日报》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时,还要选登干部强烈要求落实政策的来信,由点到面地报道各地落实干部政策的消息,逐步打开局面。

1977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以醒目的通栏大标题,发表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一文;二版仍以此为总题目,选登了五封读者来信,并对各地落实干部政策情况作了连续报道。凭借着这股劲风,中组部的同志上书中央,强烈要求撤换中组部部长。叶剑英、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也出面过问此事。

12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委派父亲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

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父亲走马上任时,等待他的不只是欢迎的鞭炮,还有档案室里堆积了好几间屋子的冤假错案材料。

据当时中组部不完全统计,全国脱产干部约有1700万人,历次运动中立案受审查的约占17%,加上被株连的同事、亲属,共殃及到1亿多人。审查材料大部分无限上纲,多为不实之词。

所以,当中组部大院里欢迎的鞭炮烟雾还在弥漫时,父亲已经在二楼召开处长以上干部会议了。部里的同志们将父亲在这个初次见面会上的讲话,视为他的施政纲领,连同他会后的决策,归纳成“一句话、两个要求和一个大动作”。

“一句话”就是“积案如山,步履维艰”。

父亲神情严峻地指出:“这山究竟有多高呢?光是人人熟知的‘文革’期间重大案件有多少受害

者,就谁也说不清。还有‘文革’前的历次政治运动……还有建国前囿于历史环境和条件而形成的一些冤假错案,一直推到当年苏区的冤案等等。这叫:‘积案如山’!”

“‘两个要求’,一是要恢复和发扬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的官衙习气,使每个来访的党员、干部,都能感到一视同仁的温暖。二是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请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也望任何同志不要主动代劳处理,更不能扣压。”父亲特意交代秘书:凡是地委副书记以上干部的申诉信,必须送他批阅,不得代他处理;县委书记以下的来信,可转信访部门处理。

“一个大动作”,就是会议一结束,父亲便将中组部还在“靠边站”的杨士杰、张策、章蕴、曾志、蹇先任、陈野苹、何载等几十位部局级老干部,一一请来谈心,分别给他们安排工作,请他们帮助分担平反冤假错案的重任。随之成立了一个专门负责落实干部政策的庞大的审干局,由曾被错划为右派的何载任局长,辅之以六位副局长。

这时,中央组织部的行政机构尚未调整,但在第一天的工作会议上,父亲就以一种人人都能感受到的紧迫感,将部里回京待分配的干部、老年支部的干部和一部分在职干部,合编成老干部接谈组、待分配干部组和右派改正组,指定由陈野苹副部长负责,认真做好来信来访工作。

会上,父亲特别强调指出:“一定要以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来做接待工作,对年老体弱走不动的老同志,可以用车接到部里来谈;患病在床的,我们应该主动拜访,找上门去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对那些来访的蒙冤多年的老同志,要让他们坐在沙发上,沏上一杯热茶;到吃饭时还没谈完,就请他们吃顿便饭。一次谈不完就谈两次、三次……”

中组部的工作一铺开,父亲整天忙得寝不暖席。那年父亲已64岁,可是为了重建党的实事求是的组织路线,他以惊人的毅力,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忙到中午,父亲总是自己拿着碗到部里食堂,一边排队打饭,一边与有关同志谈工作。吃完饭回到办公楼,就躺在会议室的长沙发上看人民来信。

他上任的第一个月里,每天都几百人到中组部上访,光收到的来信就装了六麻袋。父亲身体力行,除了每天晚上几小时的睡眠以外,剩下的时间他几乎都在与人谈话或处理来信。

中组部的同志曾做过粗略的统计,父亲在任中组部部长的一年零一个月里,平均每天处理副厅局、地委书记以上级别干部的申诉信 33 封,最多时一天处理 200 多封来信。经他手处理的信件,有的作了批示,有的亲自回复。

中组部干审局副局长王荣光回忆说:这一年里,耀邦同志光是批给干部审查局的信件就有 902 封,封封都有他的亲笔批示。

然而,此时离具有伟大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有时日,中国还没有完全摆脱极左思潮的严重影响。因此,平反冤假错案不仅需要大无畏的开拓者精神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坚定信念,还需要有斗争的策略性和灵活性。

父亲认为,要排除对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干扰,必须从教育入手,讲清问题的实质,打通思想。

1978 年 1 月,他在一个材料上批示:“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正是为了稳定和发展形势,不是翻烙饼。把过去做错了的事情坚决改正过来,这是忠于实事求是的原则,具有革命胆识的表现,体现了我们共产党人对革命、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这和右倾机会主义毫不相干。如果在大大非面前不尊重事实,不坚持原则,知错不改,将错就错,那才是怯弱的机会主义态度。”

父亲在分析“为什么有人对落实政策总是犹犹豫豫,怕前怕后”时,清醒而婉转地说:“我看有两种情况,一是认识问题,一是私心杂念。认识问题比较好解决,私心杂念比较难一点。我这里说的私心杂念,主要是指有些同志过去主持或参与搞了错案,伤了一些同志,现在又缺乏纠正错误的勇气。他们口头上说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怕否定自己。”

父亲认为,各种案件真正的材料都在文书档案里,每个案子的缘起,调查所得的旁证材料,结论引用的材料是否有失偏颇,都要看文书档案才能弄清楚。为了对党对同志负责,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案

件还是通通交给中组部复查。

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是于 1967 年夏由中共中央决定成立的,是负责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高级干部进行立案审查的专门机构。下设的办公室,“一办”负责中央机关和各省、市领导人的专案,“三办”负责公检法系统的专案。虽经父亲反复交涉,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移交档案一事,从年初一直拖到 5 月仍无结果。他们不但不交档案材料,索性连中央档案馆的资料也封起来了。

5 月中旬,邓小平的一个批示转到中央组织部,要求为中央的几名高级干部复查。而这几名高级干部在“文革”中受审查的档案材料,全都封存在“一办”。父亲借此机会首先取得了邓小平、叶剑英两位副主席的支持,然后在向华国锋主席汇报工作时,专门反映了“六十一人案件”的当事人及其家属强烈要求复查此案的请求,表示中组部准备进行复查,要求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将档案移交给中组部。

华国锋同意了。1978 年 5 月,中央决定把中央专案审查小组下属的“一办”、“三办”掌握的专案材料,全部移交给中央组织部。

6 月 9 日,中央专案领导小组负责人在人民大会堂召集父亲和中组部副部长陈野苹、公安部长赵苍璧以及有关部门领导参加移交会议。然而,移交时那位中央副主席坚持不移交所有的专案材料,说:“一办”和“三办”的案子,没有“四人帮”的干扰,都是中央讨论过的,是毛主席批示的。不要因为粉碎了“四人帮”,过去定了的案件就要推翻。“六十一人”的案子是经过毛主席和党中央批准才定案的。还有彭德怀、陶铸的结论,也不能随便翻过来。

父亲当即针锋相对地说:“还是有错必纠,全错全纠,不错不纠,部分错部分纠的好。”

移交会议结束了,但专案材料一直没有移交。邓小平批示予以平反的那几位高级干部的档案材料,经多次交涉后,也只交了其中一个人的三页材料,而且基本上是结论性的。干审局天天接到受诬陷同志的申诉,却因没有原始材料,无法着手复查。

(未完待续)■

注:本文选自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一书,本刊刊登内容为首次连载,与《北京晚报》所载内容不同。